

伊拉克什叶派因素突起的影响

李 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今年 4 月初以来,以萨德尔为首的伊拉克什叶派揭竿造反,加入伊拉克反美武装行列,不但造成美军伤亡人数激增,而且使伊拉克战后乱局更趋复杂化。什叶派在伊拉克人口居多数,其任何变化都将对美国主导的伊战后重建及地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此次萨德尔扯旗造反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关闭了他主办的一家反美宣传刊物,并逮捕其一名重要助手。萨德尔属于什叶派中的激进势力,并不能代表整个什叶派,但萨德尔事件却揭示了美国在伊拉克战后一直刻意回避、至今仍苦无良策的一个难题,即伊拉克什叶派在未来伊“民主”政权中的地位问题。对美国来说,什叶派问题如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布什本人的政治命运,也将影响美国中东战略的成败。美国在伊拉克既输不起,又不能脱身,处境两难。什叶派问题很可能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陷阱”。

首先,美国与什叶派在伊拉克未来权力分配上的矛盾难以调和。出于对伊朗什叶派激进政权的厌恶,美国从骨子里不希望什叶派主导未来伊拉克“民主”政权,更不能接受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类似伊朗式政教合一的什叶派国家,因此对什叶派一直抱有戒心。萨达姆倒台后,为防止什叶派掌权,美国曾企图从“海归派”中物色一个伊拉克的“卡尔扎伊”,但由于遭到伊拉克国内普遍反对而流产,最后只得按人口比例组建了 25 人的临管会。因什叶派在其中占去 13 席,美国便通过去年 11 月的交权协议及今年 3 月的临时宪法对什叶派设限。按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未来实行联邦总统制,总统委员会由一位总统和两位副总统组成,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副总统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①其目的就是防止什叶派控制未来政权。而什叶派占伊拉克总人口的 58%,无疑

将是美国倡导的民主原则的最大受益者。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推翻了独裁专制的萨达姆政权后,什叶派一直对美国相对配合,期待通过美国主导的民主选举执掌大权。但美国的做法已开始打破什叶派对美的幻想。去年 11 月,美国刚与伊拉克临管会达成交权协议,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就带头向美国发难,组织了数万什叶派群众举行游行抗议,反对美国提出的间接选举原则,要求举行全民普选,并首次公开提出美国从伊拉克全面撤军的口号。美国因担心什叶派群起造反,不得不求助联合国,在联合国做出伊拉克尚不具备直选条件的评估后,什叶派的激烈情绪才暂时平息。随着美国向伊拉克人交权日期的临近,美国与什叶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此次萨德尔武装反叛的深层原因,也是借机发泄对美国长期将其排除在伊拉克临管会之外的不满。目前,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实际已经开启了什叶派掌权的大门。长远看,美国若强行抑制什叶派的权力欲,势必全面开罪什叶派;而顺其自然,让什叶派主导伊拉克未来政权,又不符合美国的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战略。如何解决民主选举与什叶派人口优势的矛盾,成为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次,激进派领袖萨德尔已成美国的棘手难题。萨德尔言行激进,他强烈反对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并公开煽动说:“美国是伊斯兰、穆斯林的敌人,而讨伐异教徒正是我们祖先所走过的道路。”^②甚至扬言要与巴勒斯坦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结盟。自武装造反以来,他争取到大批支持者,一度控制了库法、卡尔巴拉、纳杰夫、库特以及萨德尔城。现萨德尔拥

^① “伊拉克临时宪法”,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4/03/09/000746720.shtml>

^② “伊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称美国是穆斯林的敌人”, <http://news.sina.com.cn/w/2004-04-30/19442444161s.shtml>

有近万人武装,而且软硬不吃,已成为美国的“烫手山芋”:如容忍放纵,萨德尔的地位和影响必将继续扩大,什叶派激进势力将更难控制;抓捕或杀害萨德尔,则可能导致什叶派与美国关系继续恶化。而萨德尔将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作为反抗基地,并将武器囤积在清真寺、神庙以及学校等敏感地点,更令美军投鼠忌器,越发加大了处理萨德尔问题的难度。

第三,什叶派很难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仅占 15% 左右,一直属于“弱势群体”,素有反抗强权的叛逆“性格”。^① 他们中多数人主张以宗教治国,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与美国鼓吹的世俗民主模式势不两立。另外,什叶派对战后美国主导的重建进展缓慢、无辜平民伤亡日增,特别是美国有意限制其权力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什叶派反美比例高达 98.9%。^② 这也正是萨德尔揭竿造反能一呼百应,什叶派注定难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

什叶派在伊拉克的突起,无论对伊拉克本身的局势发展,还是对中东地区的形势走向,均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什叶派内部矛盾的激化可能影响伊拉克南部地区政治稳定。伊拉克什叶派主要分布在伊南部地区,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潜伏严重危机。在萨达姆时期,什叶派各派因受到强力打压,内部分歧尚不明显。伊战后,随着权力争斗的日益激烈,什叶派内部固有矛盾开始发酵,内部纷争已初露端倪。传统上,伊拉克什叶派分两大家族:以哈基姆(去年 8 月被刺身亡)为代表的伊朗“海归派”和以萨德尔为首的“本土派”,再加上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的势力,什叶派实际上可分为三大派系。这三派历来芥蒂很深,互不信任。在 1999 年遇刺之前,萨德尔的父亲老萨德尔一直与西斯塔尼暗中比拼。伊战后,西斯塔尼与萨德尔政治分歧严重:持温和立场的西斯塔尼与美国走得较近,希望借美国之力登上权位;持激进立场的萨德尔则公开与美对抗,并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家。萨德尔虽一直在积极扩充势力,但顾忌西斯塔尼的名望,不敢造次。今年 4 月初,萨德尔终于走到前台,作为什叶派新一代领导人,他敢说敢干,如在夺取了伊拉克萨达姆城的武装后即将

该城更名为萨德尔城。2003 年 7 月,为了争夺圣地纳杰夫的控制权,萨德尔武装又与温和什叶派发生冲突。同时,在伊拉克中部城市,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也发生内部火并,造成 9 人死亡。

哈基姆家族与萨德尔家族互为政治死敌。哈基姆作为伊拉克最大的什叶派组织——“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因被萨达姆追杀而流亡伊朗长达 20 多年,直到萨达姆政权垮台才正式回国。他回国时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热烈欢迎,一度被视为什叶派的代表;加上哈基姆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派其兄弟出任临管会成员),激起同宗同族人的妒忌和仇恨,回国仅几个月就遭暗杀。据媒体披露,此案可能系萨德尔所为。今年 4 月 11 日,萨德尔在库法举办首次周五布道活动期间,亲美的马吉德·赫埃伊也在纳杰夫被杀,美国指控此事也是萨德尔策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什叶派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将愈演愈烈。此外,伊战后,美国拉拢“海归派”、安抚中间派、冷落“本土派”的政策也加剧了什叶派内部的权力争斗。

二是什叶派坐大必将加剧伊拉克国内各民族与教派之间的权力争斗。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基本呈三分天下之局:南部什叶派区、北部库尔德区以及中部逊尼派区。逊尼派总体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打压和排挤,从“人上人”突变为“人下人”,严重的失落感导致许多人走向极端,他们不但反对美国人,而且不愿看到什叶派主导伊拉克未来政权。如果什叶派势力继续扩大,在美国交权后,双方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北部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扶持下已获自治地位,但什叶派已多次公开反对库尔德人扩大自治权。2004 年 3 月 8 日,伊拉克临时宪法授予库尔德人对永久宪法的否决权,此举招致什叶派的强烈不满。

(转第 59 页)

^① 在历史上,由于什叶派宗教领袖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被什叶派视为先知的正统继承人)和阿里之子侯赛因均系被害身亡,因此,什叶派逐渐形成强烈的历史悲情意识和狂热的宗教神秘主义。什叶派信徒自残身体、以身殉教的极端事例可说屡见不鲜。而伊拉克拥有什叶派最大的宗教圣地,什叶派承认的 11 名“伊玛目”(伊斯兰教领袖)中,有 6 名的墓地在伊拉克(于时语:“什叶派面面观”,<http://www2.fhy.net/forum/XXGC/posts/114.shtml>)。其中库法和卡尔巴拉分别是阿里和阿里之子侯赛因的殉难地,而阿里的陵墓又在纳杰夫。这些圣迹既是什叶派的精神寄托也是其骄傲,最能激发什叶派的宗教狂热。

^② “近 98% 伊拉克人反美,中东面临失控美军不敢撤离”,<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4/13/content-1416129.htm>

乏和滞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提出基本命题的时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距今已有将近 30 年的时间了,其时效性毫无疑问会大打折扣。

从理论层面看,修正结构主义单单坚持从现实主义物质权力观去考察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采取了一种静态的结构观,忽视了这么几个重要的因素,即制度本身会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对国家产生规范化效应;国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其偏好会受到国际社会结构中的规范与原则等的限定;影响国家政策选择的不仅是外部和内部环境中的权力因素,还有自我利益再界定、决策者的认知、机制的限制能力等重要因素。克莱斯勒在 199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依然坚持国际制度研究中权力定位方法的重要性,强调要将国家行为与权力直接联系起来。^①甚至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他的这种权力偏执观还是没有改变。^②

从经验层面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内部不但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而且将国内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经济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压力迫使它们只有学会融入国际体系,接受自由规范和原则,才能增强危机处理能力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国际组织的社会化功能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利于促进它们逐渐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和原则,从而改变对国际制度的偏好和选择。

其实,还存在许多其它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传统”观点,如认为参与国际组织会削弱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和对其国内外政策造成巨大限制等。实际上,国际组织虽然会影响成员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对它们的某些国内政策形成冲击,但并不会直接干预到它们的国内决策过程,也没有对其国家主权形成重大的限制。国际组织只是限制国家对外事务的绝对自由,而不会改变国家的核心主权原则。^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 21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制度(或者更广泛层面上的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

建构主义只是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国家的社会化意义,而从微观进程考察国家社会化的理论文献不多。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是根据纯粹的利益计算来改变对国际制度的偏好和行为,而是实现了对国际规范的内化,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它们改变国际制度偏好和行为不是适应性而是习得性的。实际上,这即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是不大可能如此泾渭分明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内的接触,特别是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多边环境和综合性的理论评估框架中的互动和交流,确实可以促使它们逐步认同与接受国际规范与准则,这对于它们的国际制度偏好和行为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文木)

① 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234—249 页。

② 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 in David Smith, 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 eds., *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③ Magdalena M. Martin Martinez,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 215.

(接第 30 页)西斯塔尼公开要求联合国不要承认该宪法,双方关系潜伏危机。目前正值权力移交的敏感期,什叶派在伊拉克政坛影响和地位的上升,极可能引发其他派别的警觉和反弹。因此,萨德尔激进派的“揭竿而起”不能仅看作是个案,而是在美国倡导的“民主制度”背景下固有种族、教派矛盾的迸发和释放。如美国不能“摆平”,那么所谓的“民主伊拉克”很可能有演变成第二个前南斯拉夫或黎巴嫩之虞。

三是伊拉克什叶派坐大,也将挑战阿拉伯国家长期由逊尼派主导政权的传统。由逊尼派主政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普遍排挤什叶派,因此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的提升,很可能在一些国家引发什叶派的

连锁波动。伊朗作为该地区唯一由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期望伊拉克出现一个什叶派政权。而此次为平息萨德尔叛乱,美国破例要求伊朗介入调解,则为伊朗提供了继续扩大与伊拉克什叶派关系的历史机遇。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具有传统宗教亲缘关系,伊拉克许多什叶派组织,如“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伊拉克号召党”等均与伊朗关系密切。其中,“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总部就设在伊朗,其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由伊朗提供。伊拉克什叶派影响的扩大,势必提升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什叶派主导伊拉克未来政权,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悄然生变。○

(责任编辑:郭志红)